

[学苑话题]

12

陈平原 著

假如没有“文学史”

.....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学苑话题】

陈平原 著

假如没有“文学史”

.....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如没有“文学史”…… / 陈平原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7
(学苑话题)
ISBN 978-7-108-03718-3
I. ①假… II. ①陈… III. ①文学史—中国—文集
IV. ①I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63764号

责任编辑 卫 纯
封扉设计 陆智昌 蔡立国
责任校对 何 敏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1年7月北京第1版
201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20.75
字 数 266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36.00元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3）、第一、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2002，2006）、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6）、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09）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著作三十余种。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小 引

终于赶在开学之前，完成此书的编选及校对，自然是大大地松了口气。

去年10月底，将《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书稿交给北京大学出版社；做完索引，发现篇幅太大，于是撤了一组短文。当时就想，日后会刊行一册与此专业著述相呼应的小书。因为，谈论作为著述、课程、学科以及知识体系的“文学史”，是我最近十几年所做的主要工作，手头还有不少零星文章。

1月中旬，结束讲学任务，回到北京，翻阅去年年底刊行的《现代中国》第十三辑，发现打头阵的是宇文所安、田晓菲夫妇和北大中文系教师座谈记录，题为《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那次座谈会是我主持，现场气氛很热烈，重读记录整理稿，依旧兴致盎然。原来，各家对于“文学史”的理解，竟如此错综复杂、五彩缤纷。

其实，不只同一现场“众声喧哗”，同一作者也可跨越时空自己与自己“对话”。想想我头一回认真讨论文学史问题，是撰于1995年的《“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其中有这么一句：“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十五年间，我的很多论述，都是围绕这句话打转——众多评论、随笔、序跋，其基本思路不外是在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如此反省当今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

“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我看来，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

什么是“文学”，如何进行“文学教育”，怎么看待文学史课程及著述，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思想史、学术史立场之外，必须兼及教育史的视野。之所以如此强调，除了学术判断，还有作为教师的切身体会。从1996年起，我在北大中文系多次开设“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等学术史方面的课程，希望为学生拓展学术视野，利于其日后学园路上的寻幽探微。这里有此前撰写小说史、散文史积累的经验，有阅读西方理论家著述获得的灵感，但更多的是从学术史角度进去，有所体会，有所批评，也有所借鉴。谈及此，不能不牵涉上世纪80年代末追随导师王瑶先生编写《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以及90年代初与友人合作创办《学人》并提倡学术史研究的努力。

2005年秋，我曾在《现代中国》第六辑的“编后”中称：“在正襟危坐的论文之外，建立‘对话’栏目，容纳若干很有见地、但未必符合学院派脾性的‘言谈’，也算是有张有弛，相得益彰。作为文体的答问、对话、座谈、演讲等，不可能像专业论文那样精雕细刻，但其‘逸笔草草’，也自有其特殊魅力。”这一思路，至今仍觉可取。念及此，决定提前编选关于“文学史”散论的小书，以便与北大出版社即将刊行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相呼应。

这册小书，包含“何谓‘文学史’”、“新旧文学史著作”、“文学史会议及文集”、“另一种‘小说史’”、“文学史研究新视野”五辑。如果说《作为学科的文学史》集中讨论学科建立、学人著述、专业领域三大问题，撰文时正襟危坐；那么，眼下这册小书，更像是作者随手采撷的闲花野草，虽则散漫，却也鲜活。二者互相观照，别有一番趣味。

至于以“假如”为书名，并非全然抹杀“文学史”的价值，

而是蕴涵“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反省与质疑。就像书中同题文章开门见山所说的：“在我看来，‘文学史’是一门既可爱又可疑的学问。”质疑眼下遍地开花的“文学史”著述，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呼唤“兼及技术含量、劳动强度、个人趣味、精神境界”的“可爱”的“文学史”。

2011年2月2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目 录

001 小 引

第一辑 何谓“文学史”

- 003 “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
- 007 四代学者的“文学史”图像
- 013 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
- 021 反思“文学史”
- 025 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
——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
- 031 “文学”如何“教育”
- 038 俗文学研究的精神性、文学性与当代性
- 044 假如没有“文学史”……

第二辑 新旧文学史著作

- 055 《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序
- 064 折戟沉沙铁未销
——新刊来裕恂撰《中国文学史》序
- 076 “哲学”与“考据”视野中的“文学史”
——新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序
- 088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小引

- 096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后记
- 101 《文学史》集刊编后记（三则）
- 105 《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小引
- 107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 109 “尝试论丛”总序
- 112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后记

第三辑 文学史会议及文集

- 121 从“议程表”说起
 - 在“晚明与晚清”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 124 《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小引
- 126 《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序
- 129 《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序
- 133 图像的北京
 - 在“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 137 “教育”的边界与魅力
 - 在“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 139 《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序言
- 148 “左翼”、“时代”及“文学”
 - 在“左翼文学的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 附录：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
 -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日本
- 155 学术史课程的理念与实践
 - 《学术史：课程与作业》代序
- 161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课程作业

- 163 作为“文化工程”与“启蒙生意”的百科全书
——《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代序
- 181 《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序言
- 191 《红楼钟声及其回响——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小引
- 194 《都市蜃楼：香港文学论集》小引

第四辑 另一种“小说史”

- 199 小说家的小说史论
- 203 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
- 208 戏谑小说与旅游叙事
- 212 宝玉的意淫与柳生的侠义
- 216 童心与诗心
- 220 历史小说与小说历史
- 224 艺术感觉与史学趣味
- 228 “悲凉之书”
- 233 学问中的“情爱”

第五辑 文学史研究新视野

- 241 “通俗小说”在中国
- 259 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
- 276 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
——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
硕士学位论文
附录 北大中文系近二十年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
及硕士学位论文
- 301 文学的都市与都市的文学
——中国文学史有待彰显的另一面相

第一辑

何谓“文学史”

“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

对于今日中国的大学生来说，“文学史”既是一门必修课，也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知识体系；而对于大学教授来说，撰写一部完整的可以作为教材的“文学史”，更是毕生的追求。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可以千变万化，但写作策略以及研究思路则岿然不动。面对如此坚挺的“学科”，我想提一个小小的问题：“文学史”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破除“迷信”的最佳方法，莫过于思考这一学科的建立，以及这一知识体系的诞生。

“诗文评”及“文苑传”的写作策略，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确有一定的区别。但这不等于说，古代中国人在谈论（评判）文学时，没有“史”的意识。刘勰、胡应麟、焦循等人的见解，仍为今日的文学史家所津津乐道。只是古已有之的“文章流别论”，转化为今日流行于学界的“文学史”，仍应归功于西学东渐的大潮。这里涉及晚清以来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五四文学革命提倡者的自我确证，以及百年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化。在我看来，还有一个环节值得关注，那便是教育体制的嬗变。

有必要重新探讨晚清西方教育体制的引进对中国传统学术精神的冲击、“学部章程”等教育法规对于学术转向的诱导，以及文学史教科书编撰方式的流弊、西方（含日本）汉学家的正面及负面影响。在 20 世纪中国学界，“文学史”作为一种“想象”，其确立以及变形，始终与大学教育（包括 1950 年代以前的中学教育）密不可分。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

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

“文学史”之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教育改制。废除科举取士，开办新式学堂，此举对于中国文化进程的影响极为深远。晚清学部（以及民初的教育部）对于课程设置、教科书编写和学生考试方法的规定，乃“文学史”神话得以成立的决定性因素。1902年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文学”相关的课程，只是“诸子”与“词章”。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则规定，“中国文学门”的科目包括“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源流”、“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西国文学史”等，并有明确的提示：“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第二年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馆的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章节安排完全依照学部章程的要求，并且坦承此乃“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1〕。汉学家（正如林传甲所说的，笹川此书“其源亦出欧美”）影响中国教育的决策者，决策者制订的章程又制约着中国学者的论述策略——这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但颇有象征意味。“五四”以后，中国学术日渐独立，研究者不再直接受制于汉学家的思路；至于教育部颁布的规章制度，则仍然深刻影响“文学史”的著述与流通。

“今代学制，仿自泰西；文学一科，辄立专史”〔2〕，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明显对此趋势不以为然；但既然执教大学，便不可避免地投入“文学史”的写作。鲁迅1930年代多次表示撰写“文学史”的愿望，但终于落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其脱离大学校园的“庇护”，也没有写作讲稿的“压力”〔3〕。

〔1〕 参阅夏晓虹《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载《文学史》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2〕 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第1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3〕 参见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第五节“学界边缘”，《学人》第四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

说到底,体例明晰、叙述井然、结构完整的“文学史”,主要是为满足学校教育需要而产生的。这就决定了其写作很容易受到政教权力的控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人刘知几所述官修史书所面临的困境^[1],对于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史家来说,并不陌生。全国统编教材,有利于“文学史”权威之建立,这对组织者及编撰者是个极大的诱惑;但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不允许冒险闯禁区,绝难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必须考虑各种利益集团的需要,平息各种学术流派的纷争,因此,只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作为普及教育的工具,此类著作当然必不可少;但将文学史研究等同于撰写教科书,则是天大的误会。

从“诗文评”、“文苑传”转为“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此乃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自觉选择。由此而使得这个世纪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与叙述,迥异于前人。“文学史”在本世纪中国学界的风行,主要得益于“科学”精神、“进化”观念以及“系统”方法的引进^[2]。分析这三大支柱的形成,以及在中国学界的流变,需要更多的篇幅。这里只提出两个小问题:一是以西方的文体观念来剪裁中国文学,提倡“小说”而冷落“文章”,这一学术转型既带来无限生机,也隐含着蔑视中国固有文类的陷阱;一是所谓“清儒家法”、所谓“神悟”与“体味”,以及重新弥合“文”与“学”的追求,始终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声音。

[1] 刘知几撰《史通》,《忤时》篇力陈设馆修史之“五不可”,《辨职》篇则正面立论:“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解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岂与夫冠猴献状,评议其得失者哉!”清人万斯同、焦竑等对此有进一步的发挥,参见《潜研堂文集·万先生传》引万斯同语,以及《潜园集·论史》。

[2] 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莫过于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1923年)和郑振铎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1927年)。

“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从一个特定角度，凸显了中国人对西方教育体制和研究范式的接纳，以及对固有学术传统的改造。反省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研究，目的是为了重新寻找出发点。

（此乃作者 1995 年 10 月在香港科技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学史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要，初刊 1996 年 7 月 10 日《中华读书报》）

四代学者的“文学史”图像

描述近百年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轨迹，并非易事。即使纯粹出于技术上的考虑，暂时以中国大陆的研究成果为对象，不涉及海外汉学家以及台湾、香港地区学者的贡献，这百年学界的风风雨雨、春华秋实，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历史现象错综复杂，而且尚在流动变迁之中，为了便于把握和描述，首先必须借助某种理论假设，将这百年学术进程分层处理。

有三种可供选择的分析框架：以时期（period）、以运动（movement）或以世代（generation）为中心，来展开论述。每一种研究框架，都有其无法避免的局限性。比如，同代人中，学术追求五花八门，绝非“主旋律”所能概括；另外，学术总是处在新旧交叉、左右渗透的状态，硬要把它排列成前后有序、准确无误的不同“时期”，必然伤筋动骨；至于将学术史设想成若干有共同趣味的学者在共同理论旗帜下从事研究，并因而形成各种“运动”，则又未免过于天真。如此说来，只能“两害相衡取其轻”。这里暂时以“代”为主，以“时期”及“运动”为辅，来展开论述。也就是说，借助若干“代”学者的“共同追求”，体现近百年“文学史”研究的进程。

之所以选择“代”而不是更常用的“时期”，很大程度是考虑到特殊的政治变故（如抗日战争、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使得许多学者无法正常发挥其才华，学术成果的面世大大滞后，若按时期划分，很可能整个学界面目模糊。几代人在同一瞬间呈现，而且缺乏必要的呼应与联系，造成这种互相争夺舞台、因而